

译者培养与理论创新：克里斯蒂安·诺德教授 访谈录

但海剑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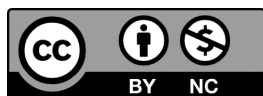
摘 要 |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当前德国翻译功能学派的领军人物。1967 年始，诺德教授先后在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等多所大学进行翻译教学和研究，发表 80 多篇论文，主要涉及翻译中的语篇分析、译者培养和翻译的功能分类等方面。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诺德教授应邀出席在武汉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中西部地区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暨翻译研究国际论坛，并发表题为“Function Markets in Text and Translation”的主题演讲。演讲结束后，笔者对诺德教授进行了采访，内容包括：对翻译的理解，目的论的发展，翻译与“文化走出去”，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对翻译工作的影响。访谈以英语进行，本文是译稿，以期对我国的翻译教学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 | 目的论；翻译硕士；课程教育；文化传播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但海剑教授（以下简称但）：您的翻译理论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我想和您谈谈您对中国翻译的看法。如您所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至世界各地，很多经典作品译成多国语言，以此弘扬中国文化。

诺德教授（以下简称诺）：我认为，目前世界上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潜在读者相对较少。但总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潜在读者可能学过中文，但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鉴于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大图书市场上中国翻译作品的份额。在这个问题上，出版商能起很大的作用，政府应当给予他们支持。

但：顾彬教授曾说，德国人非常喜欢阅读。有的作家在写作时还做大量的翻译工作，他认为德国是注重翻译的国家。

诺：德国确实如此。这些作家被称为文学译者，但他们可能并未经过严格的翻译训练。我做翻译，但并不是文学领域的专业翻译，也不是法律、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专业翻译，这些我们称之为翻译项目。我曾经教授过文学翻译这门课。也有出版商找过我做文学翻译，是一名拉丁裔美国作家的作品，需要翻译它的英文版本。而我是西班牙语翻译，同时也做英文翻译，但我认为由我来做这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不专业的。如果当时我答应了出版商的要求，

现在我也许会从事文学翻译这一行业。译者一旦进入到某个专业领域做翻译,就会在这个行业长久地做下去。

但:听说您掌握了好几门外语?

诺:我能阅读很多种外语资料,这在欧洲很普遍。我来到中国后,发现许多人都懂一些简单的外语,这是很好的趋势。但是,即使我很懂中文,我也不敢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但:所以欧盟花费了很多钱在翻译上,因为他们希望能保护到每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浪费。

诺:在欧盟,你可以看到法令条文都被翻译成了24种语言,这些都是欧盟的官方语言。有些文本被译为多种语言后,并很多人没有人去读,从这层面上讲,可能是浪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就是欧盟的语言规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所有的成员都需要得到平等对待,这是为了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委员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很多原文文本可能并不是英语。所以,如果你是委员会的一员,你就有权拥有自己的文字,这并不是浪费。

但:所以,他们需要通过翻译来保护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

诺:其实,翻译行业同样非常需要中文。在德国,几乎没有教中文的机构。在我工作过的一所大学,开设过中文课,但是上课的学生很少,只有六位。过了段时间,四名同学退学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张教授负责那两位学生的课程。后来,校方发布道歉声明,因为学校负担不起教授的费用。但学校还是给了这两位学生毕业的机会。再后来,中文课就停止招生了。

但: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发展的热门话题。有人说人工智能会影响翻译行业发展。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看法。此外,关于科技是否会改变翻译研究的范式,我们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改变翻译行业了。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机器翻译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翻译这门学科,我们也有各种翻译软件。这些似乎威胁到翻译这一职业。目前来讲,年轻学者们对语料库研究的热情也日益高涨,翻译研究发生了变化。我自己也有语

料库,但是不在机器上,而是在纸上,我会自己手动分析。我认为基于语料库研究的主题是部分的。在研究开始前,你首先必须知道你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分析。但是,仅有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我调查了一个拥有两亿词的语料库,可那又怎么样呢?你该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呢?你只能把这些数据提取出来,进行客观解读。这和我手工做的语料库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已经用大脑将这些数据分析了一遍,所以我不会把研究丢给电脑去做。但是电脑的确对信息搜集帮助颇多。一台联网的电脑就可以查找到想要的资料。假若我想引用某本书中的一段话,我可以在网上找到这本书,下载下来,这样我就不用去图书馆了。

但:这会节省很多时间。

诺:是的,这样我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解决翻译问题上,去探索更好的研究方法,或是其他更有意义的事。

但:我想介绍一下中国的翻译硕士培养计划。翻译硕士课程偏重实际应用能力。我个人认为这种设置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就业,因为目前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不相同。

诺:没错,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可能毕业都去当老师。市场不知道该如何定位和对待外语毕业生。

但:您对那些想成为翻译学者或翻译从业人员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诺:首先要确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成为一名译者或学者。这是工作目标,伴随着个人的发展,但最好不要同时有两个目标。如果你想成为翻译学者,那有很多种可能性,你可以成为教师,或研究如何提高机器翻译的质量。如果你想成为译者,那么你就要在某一领域变得专业。欧洲有些公司已经取消了翻译部门,他们通常将翻译项目外包给翻译公司。所以,如果你想在欧洲做翻译,你至少要先考虑成为自由译员。之后你努力工作,获得认同,让自己出名。你要加入某个翻译协会,了解该领域的案例。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由熟悉变得擅长,你就可以深入钻研这一领域,让自己成长得更专业。

但:这同样也涉及专业问题。我们总是说,作为译员,你需要对所有领域都有所涉猎,而非对某一行业尤为精通。

诺:对,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欧盟,有两

类翻译。一类是训练有素的译员，他们对所有行业都有所了解，但却并不仅是精通某一行。另一类译者会精通某一领域，如科技、法律等，像对法律行业精通的译员，就被称作法律专员。我有一个博士生曾做过研究调查，很有趣，因为你能发现这两类译者的不同，但遗憾的是，她并未完成这项调研。

但：在我们武汉理工大学，我们的特色专业是材料科学、汽车工业和交通运输。

诺：你们可以从这些专业找学生做翻译，来培养出这个领域的专业译员，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专业译员收费很高，因为他们涉足更深的领域知识。但总体来说，这两类译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客户总会有不同的需求。并且，如果你发现你在某一领域很专业，那么你几乎不能再做其他行业的翻译了。

但：我对您的理论很感兴趣。如果我们把翻译看作一种沟通，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其他领域的理论，比如传播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将他们的理论运用到翻译学中。

诺：目前时机还未成熟。目的论是基于行为的理论。有人把目的论看作社会经济学理论，因为接受者也就是受众。所有与原文相关的人物，作者、目标语受众以及译员，都是社会成员，于是翻译社会学就出现了。这是翻译学的分支，但我并不想称之为社会语言学。我后面会有一场关于译者中心论的主题演讲。目的论将译者放在中心位置，当我还是学生时，我所接受的翻译理论训练中，从未提及过译者。

但：译者是隐形的。

诺：完全隐形。目的论实际上是基于行为理论的。行为就必须要有中介者，这个中介者就是译者。所以我认为，目的论实际上就是译者中心论。

但：我读过一些中文文章，认为您是目的论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诺：是的，我女儿是第三代。她也是一名学者。

但：她也研究翻译？

诺：她在海德堡大学接受翻译训练。我妈妈，我和我女儿。我女儿是第三代，她是自由译者，获得了应用翻译学的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专业译员使用的翻译工具。在谷歌出现之前她就开始做研究了，并且在谷歌出现前一年发表了文章。

但：作为目的论的第二代领袖，您认为您在

哪些方面发展了目的论？目的论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为第二代，我们发展了目的论的实际应用，虽然目的论并不一定是可应用的。但它可以是一个可视化的模型，让人们知道如何去看待翻译。第二代理论家中人很多人都当过老师，他们将目的论运用到翻译教学中去，而且效果不错。以我为例，我在大学的四十年里，教了很多学生，这就是这一代人的贡献。这些人里，有不少从事文本类型分析或是课程设计相关的工作，比如费米尔。在教学方面，我们已经在约旦大学设立了目的论指导的阿拉伯语翻译课程。我也曾受澳门理工大学邀请做课程顾问，从理论到实践，创设课程供研究生学习。

但：也包括教学应用吗？

诺：是的。第四代人目前正在研究教学应用，主要是西班牙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他们使用目的论来分析译者工作的场所。

但：我还希望能多了解一些您的故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翻译工作的？

诺：1963年。但是我母亲在1939年就已经开始做翻译了，二战期间她开始了研究。口笔译学生在前两年的学习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但是两年之后，你必须在口译和笔译之间做出选择。我在做出决定前，去参加过一个会议，在会议同传间里，两个学生汗流浹背地进行着口译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不属于口译。我热爱我的笔译工作。我是完美主义者，我喜欢完美的文本，虽然这样的文本并不存在。我希望自己的名字能以译者的名义出现在书的扉页。

我的翻译老师卡塔丽娜是位很优秀的教师，她待我很严格。她没有孩子也从未结婚，所以从心理上来讲，她可能把我当做了她的孩子。在结业考试前两周，她问我是否愿意留校任教。我很紧张，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但她鼓励了我。24岁时我开始教书，但并未想到要去做翻译研究。后来，我告诉卡塔丽娜，我要生孩子了。再后来，我忙于教书、孩子、丈夫和家庭中所有的事。全职的工作让我没有时间想着去做研究，但是我的职业规划是明确的。但当我35岁时，我感受到了危机，就是常有的中年危机。我已经教了十年的书，接下来的三十年，我还得继续过着同样的生活吗？我想摆脱这样的危

机,所以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翻译学还没有博士学位。

两年后,论文答辩成功。40岁时,我丈夫问我:“你现在已经有了博士学位,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在德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你必须取得资格证书,就像第二博士学位一样,不然就没有申请教授的资格。这就成为了我下一个目标。我问我的丈夫,我这样做值吗?我丈夫说,为什么不呢?教学过程中你已经积累下很多材料了。于是我就写了一本关于文本分析的书。然而,一些教授不喜欢这样,我曾经是他们的学生,现在突然要去告诉他们我喜欢翻译理论,至少有的男教授是不喜欢的。我自认为不是一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如果我不是女性,也许事情就有所不同。但我没有抱怨,因为结果还是好的,只是来得晚了些。我出版了这本书,但我并未用这本书来申请资格证,这本书后来成为了畅销书。接着就有很多会议邀请我参加,但这才是刚开始。后来,我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于是我开始在国际上知名,但我一如既往的对待教学工作。我终于有了教学以外其他的工作。之后有人邀请我去越南做客座教授。再后来,我被问到“你想要得到资格证书吗?”我说当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资格证书一直是我的心头结。于是,我又写了一本书,以德语的形式出版,我也顺利申请到资格证。十年后,我回头看,我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孩子也长大了,我可以到处去做演讲。但是在德国,当孩子还小时,很难完成这些,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但:在中国你得同样努力,一个母亲这样做更加艰难。

诺:我知道中国的母亲肯定也能完成这些。虽然我的目标很晚才实现,但是至少我做到了。今天有些学生问我,您是如何做到如此出名的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发生了。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没做,但或许是因为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做了对的事情。我享受这个长久的过程,并且一直为之努力,这是我应得的。至于到底是怎样出名的,已经不重要了。

但:刚才您提到,费米尔他们曾鼓励并不断推动你前进,是吗?

诺:卡塔琳娜和费米尔确实是真正推动我不断向前的两个人。

但:他们仅仅是精神上鼓励您前进吗?还是给过您一些实践上的指导?或者他们只是说:“没问题,你能做到的。”

诺:在德国,如果你想要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申请教学资格证书,你得靠自己。你提交申请给学校委员会,等待回复。所以,在这段时间,我没有得到资金支持,我必须找份工作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但:在您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他们有参与吗?比如,他们和你讨论过吗?

诺:没有。我一直是一个孤独的研究者。我甚至从来就没有秘书,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我的书也是如此,我自己做版面设计,并且乐此不疲。如果我要告诉别人怎么做,那还不如自己做比较好。

诺:所以当我把费米尔的书翻译成英文时,我和莫娜·贝克有过一些争执。在排版的时候,一些很长的例子常常要占据一两页,作为读者,你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例子还是已经进入了正文。所以我对她说,在例子后面我需要解释说明。我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在有些事情上还是要坚持,这也是翻译功能性的一部分,读者会从中受益。如果翻译的语言不是本国语,我甚至会在音节上做记号。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个可研究的领域。有时候我也会想,译者在翻译中应该做些什么,除了把一国语言译为另一国语言,在研究方面还需要做些什么?在格式排版上需要做些什么?和客户沟通时需要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可以去做访谈,去专业译者的工作间做访问,就像我女儿那样。

但:这要求很高。

诺:是的,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目的论只是给出了假定,还需要有实证研究,我们现在有人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但其实目的论和功能主义还有很多研究要做。

但:是的,道阻且长。刚见面时,我们就探讨了翻译学的地位。翻译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独立于语言学甚至是应用语言学。但是您刚刚提到,我们可以认为翻译学属于文化应用研究。

诺:是的。当我还是一名翻译老师时,我会在翻译研究中应用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翻译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我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为你要

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也就意味着把一种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文化。但是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文化因素会让文本“变形”，造成意义的流失。

诺：是的。我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我也会说英语。我在做法语翻译研究时依然感到困难。当我读法国作者的书时，我能读懂所有的单词，但我无法了解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如果不懂对方的文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会大不相同。我发现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的就是结构主义。我们大脑里存储的记忆是文化影响下的记忆，也体现着我们的文化。例如，我们说“桌子”，日本人可能想到的是矮桌子，德国人想到的是高桌子。当我说我坐在桌子前时，我们脑海里想到的画面是不同的。如果你告诉我你是日本人，你正坐在桌前，我就知道这是个矮桌子，我脑海里的画面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需要提前了解你的文化。我之前提到过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我不太喜欢这个译本，因为它没有改变我脑海里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好的译本，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文化。作为英文译本，它是写给我这样的读者看的。所以我认为大卫·霍克斯的翻译要更好，因为它能帮助我去想象。我只能通过西方的方式来了解中国。我能跟上这个译本的节奏，因为我能暂时抛开自己的文化，假装自己是个中国人。但我固有的文化模式很难改变，我们必须承认。在翻译时，译者就是那个中间人，他们为了沟通而存在。他们让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人相遇，译者必须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但：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第三文化”。

诺：是的，就像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但我认为，作为一名译者，我们不可能处在第三空间，我们就在自己的空间，只是在中间的地方相遇了，我了解一些你的文化，你也了解一些我的文化。

但：所以，再次回到刚才提到的欧盟的文化保护问题，每种语言都要被尊重，因为每种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诺：是的。我们要学会接受不同的观点。我们都有人权的概念架构。但想法也许不同，我们必须共同商讨。这样，我们会在某个地方达成一致。我不想把你的观点转化成我的，也不想改变自己

的观点。所以我们要互相了解，来接受异质观点的存在。我们都在试图寻找一种解释，翻译是这种解释。

但：我想我对您讲的故事有些了解了，虽然说得简洁，但很精彩。现在看来，您对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都非常满意。

诺：也有过很艰难的时期，但这就是生活，你必须经历这一切。我是乐观主义者，也总是有好人帮助我，例如我丈夫，如果当时没有他，我在海德堡大学的工作就没了，生活就是这样子，你需要有人支持。

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向年轻一代推荐一些理论家，您会推荐谁呢？是您说过的美国的尤金·奈达吗？

诺：是的，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奈达的观点，但是他确实是个很优秀的人。我们曾在西班牙的一个会议上交谈过。他现在估计八十多岁了，那次他每天坐在会场听很多场发言。当时有很多人离场，但他坚持坐在那里，询问年轻学者问题，和他们喝茶聊天，很有意思。奈达是我的偶像，我想成为和他一样了不起的人。

但：对我个人而言，翻译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尽管事实上它并不新。在中国，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翻译虽然实践性很强，但它同时需要多种理论的支撑，这是最吸引我的一点。

诺：是的。经过调查，我们创设了一个本科学位让学生能像专业译者一样进行行业的翻译实践。学生还是要写论文，不要求两百页，七十页就行。让学生在特定领域做研究，如题材分析，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题材，做语料库，去发现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才是以实践为中心，可能研究的成果很小，但这是学生独立完成的，是属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但：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希望能得到您更多的指导。

诺：只要我能。我总是说，我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生活。

但：非常感谢您能参加这会议，期待您下一次的演讲。

Translator Educ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ristian Nord

Dan Haiji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Abstract: Christian Nord,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the German func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has b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t Heidelber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since 1967.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80 papers, focusing on area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translator education and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ranslation. From 18 to 20 October 2018,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sponsor, Professor Nord attended the 13th Midwe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eaching Seminar an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anslation Studies held a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ere she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titled “Function Markets in Text and Translation”. After the lecture, Prof. Nord was interviewed to share view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her understanding on trans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kopos theory, overseas prom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n her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with a view to enlightening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Skopos Theory;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ourse Educ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